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理路与理论贡献

王钰鑫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100732;桂林航天工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广西社科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基地,广西 南宁 530022)

**摘要:** 对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成和创立来说,新时代是历史基座和逻辑起点,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是立论依据和逻辑中介,历史使命是目标指向和逻辑终点。这也是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何以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基本方略;理论贡献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8)02-0020-07

## Logical Reasoning and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of the Though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XI Jinping's New Era

WANG Yuxin

(Institute of Marxism,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School of Marxism, Guilin Institute of Aerospace Industry, Guilin, Guangxi 541004;  
Marxist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Base, Guangxi Federation of  
Social Science, Nanning, Guangxi 530022, China)

**Abstract:** For the formation and creation of the socialism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XI Jinping's new era, the new era is the historical base and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the new social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is the basis of argument and logical intermediary, and the historical mission is the goal direction and the logical end point, which is also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reason why the socialist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XI Jinping's new era is the contemporary China's Marxism and Marxism in the 21st century.

**Key words:** socialist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XI Jinping's new era; new era; social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basic strategy;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党的十九大最重大的理论贡献就是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进行了提炼概括,将其命名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理论成果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

收稿日期:2017-12-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概括提炼及其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研究”(编号:16ZDD002);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现路径研究”(编号:15CKS005);广西壮族自治区社科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基地项目“文化自信的内在逻辑与生成路径研究”(编号:16MJ15)

作者简介:王钰鑫(1987-),男,河南焦作人,博士,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后,桂林航天工业学院航空航天文化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广西社科联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建设工程基地特约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紧紧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作出了独创性回答,再一次实现了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的有机融合,对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这既有利于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贡献了中国智慧,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 一、发展新方位: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判断,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基座和逻辑起点

科学判断历史方位,是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基本原则,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依据和发展遵循。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接力奋斗,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时间中处在怎样的方位?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前进的历史基座究竟是什么?对此,必须作出科学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的高度审视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的结合上进行多维度、多层次的科学分析和审慎思考,从而作出的一项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判断。如何深刻认识和把握这一重大政治判断,意义重大而深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进行深入研究、作出学理阐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中国共产党人接力奋斗、长期努力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依据。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曾预言“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sup>[1]</sup> (P1467) 历史正在并将继续证实这一伟大预言。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奋斗下,中国社会发展呈现出条理性、有序性和逻辑性,沿着社会进步逻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国家和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为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的奠定,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接力奋斗、不断积累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中国共产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反映。对此,我们党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进行一次总结。20世纪五十年代末,随着各方面建设事业的发展,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地提高。对此,我们党进行了及时、必要地总结,诸如毛泽东撰写了《十年总结》,周恩来撰写了《伟大的十年》。这些论述既总结经验也分析教训,为继续前进锚定了正确方向。改革开放之初,如何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成为亟待回答的课题。经过充分准备,1981年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建国32年历史作了基本估计,全方位地概括了这一历史进程中所取得的主要成就。比如,工业建设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比如,城乡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平均寿命大大延长。<sup>[2]</sup> (P794-798) 党的十九大则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作了简明而深刻的评价,即“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短短的5年时间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这个成就是全方位和开创性的;实现了历史性变革,这个变革是深层次和根本性的。党的十九大报告从经济、改革、政治、文化、民生、生态、军队、港澳台、外交、党建等10个方面作了高度概括和系统阐释,<sup>[3]</sup> 其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在长期发展的基础上,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这些难题的解决、大事的办成,创造了继续前进所必需的新起点,这也成为新时代最直接、最现实的基础。

社会生产力的变迁和跃升是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的根本标准。马克思曾指出,只有从“现实的人”以及“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出发,才能对人类社会历史作出科学的解释。也就是说,要承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和辩证关系,并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察,才能作出科学的判断。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判断根本依据,只能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出发,从社会生产力的现状出发,而不能从某种文献和既有材料中去寻找现成的答案,或者从某种思想体系中进行推论得出结论。今天,我们党之所以要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的判断,最根本的就是我国社会生产力已经实现了根本性的跃升,并对理论创新提出了新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准确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状况,是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键所在,也是理解为何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判断的关键所在。马克思曾指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sup>[4] [P160]</sup>从总体上来看,正是因为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直接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意味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境遇发生了深刻变革。在海外观察家看来,“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可能将由中国经济的惊人崛起而决定”。<sup>[5]</sup>“中国已经颇具前瞻性地将目光放在掌握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上、放在复兴古丝绸之路并使其成为‘全球化的下一阶段’上、放在成为气候变化相关事务领军者上。”<sup>[6]</sup>需要指出的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连续性。每一代人都是在继承前一代人创造的生产力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生产力的。这种连续性的根据就在于劳动过程的连续性。马克思曾指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sup>[4] [P408]</sup>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连续性,也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结果。因此,既要充分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我国历史发展中所具有的伟大意义,也要充分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历史意义。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使用“新时代”的范畴,并用“三个意味着”,从中华民族、科学社会主义、人类社会三个维度,深刻阐明了新时代的标志性意义;用“五个时代”,从伟大事业、发展目标、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人类贡献五个方面,深刻阐明了新时代的历史性贡献。这就意味着,我们正处于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或者说是未来历史的开端。因此,我们要把“7·26”讲话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命题和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命题结合起来进行把握和理解。这两个命题是从不同维度对当代中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历史方位作出的科学判断,既清晰地指出了党和国家事业所处的时代坐标,也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

## 二、矛盾新变化: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重大论断,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论依据和逻辑中介

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治国理政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解决的课题。通常人们根据社会发展中处于支配地位、起决定作用的那种矛盾来定义和说明主要矛盾,它是为解决社会发展主要任务而客观上必须抓住的“关键”和“基本环节”。一般来说,首先要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否则其它矛盾就不能顺利解决。<sup>[7] [P134]</sup>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人善于分析和把握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及其变化,这已经成为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实现新发展的制胜法宝。因为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sup>[1] [P322-323]</sup>进一步地说,基本国情就是由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与此同时,在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中,也必然存在着一种主要矛盾,它“规定和影响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sup>[1] [P320]</sup>如果存在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就要全力找出其中起着领导、决定作用的矛盾即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sup>[1] [P322]</sup>因此,我们党在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始终注重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变化。

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基本上被扫除,这促使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突出表现为从阶级之间的矛盾向生产与需要之间的矛盾转化。经过充分讨论和科学分析,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确认阶级矛盾已经成为次要矛盾,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sup>[2] [P293]</sup>这一矛盾的空间范围是特指中国国内;这一矛盾的实质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要求我们党在治国理政中突出发展的主题。然而,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到理论上作出科学应答,需要一个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再从具体到抽象的多次反复过程。如何正确处理这一社会主要矛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辛探索,并取得了重大的认识成果,集中表现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著作中,但这一认识成果并没有达到高度的理论自觉,由此也难以转化成为成熟的实践理性。囿于各方面因素的制约,这一时期,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随

后又发生了一些偏离,导致事业发展出现曲折。直到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中国共产党人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以毛泽东的提法为主要依据,进一步明确指出“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是我国所处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并把“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作为“中心任务”提了出来。<sup>[9] (P182)</sup>虽然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卓越见解,但它要想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广泛共识,仍然有一个过程。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此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经过充分讨论,集中全党智慧,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了规范的表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sup>[2] (P293)</sup>这是我们党经过长期实践探索而形成的科学认识,充分体现了对我国基本国情深刻而准确的把握。这一表述以其对具体实际的精准把握和深刻洞见而富有极强的解释力,从而在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上都得到重申,也成为我们党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重要依据。

中国共产党人从坚持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不变”到“变”的转变,既是由我国发展历史性变革所决定的,是推动我国发展续写新篇章的依据,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善于把握时代脉搏、勇于理论创新的表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由此就出现一种重新认识社会主要矛盾的声音。党的十五大确认我国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但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并基于当时的估计和科学分析,明确指出“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sup>[10] (P16-17)</sup>党的十六大明确使用“仍然”一词来表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没有发生变化。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两个没有变”,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中国出色的表现推动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得到显著提升,这就要求我们全方位地对我国的基本国情作出科学判断,党的十八大把基本国情、主要矛盾和国际地位结合起来进行思考,提出了“三个没有变”的论断。这成为我们党认识基本国情的重要成果。然而,经过长期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已经是当今世界上牢靠的第二大经济体,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据统计,我国有220多种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上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最完备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全产业链的国家。这就意味着,过去所讲的“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不能够准确描述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必须作出新的判断。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涵盖面更宽,层次也更高,其本质上体现的是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及时地作出新的理论和政策回应。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理论理性触摸和分析社会现实,从而深刻而精准地把握住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的深刻变化,明确作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政治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既是我们党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立论依据,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确立新的目标任务和使命担当的重要依据。同时,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并没有改变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国际地位,这是因为“在事物、现象和过程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主要矛盾的解决不会改变事物的本质。<sup>[7] (P134)</sup>因此,我们必须时刻牢记“两个没有变”,即基本国情和国际地位没有变。要言之,要在实践探索中把“两个没有变”和“一个变”结合起来进行把握和理解,它们共同构成新时代的基本内容,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现实基座。

### 三、发展新目标: 确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安排,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目标指向和逻辑终点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既是符合中国社会历史规律的历史性目标图景,也是符合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追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阶段性目标设定。它是初始环节和内控因素的有机统一,贯穿和渗透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集中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自信和价值理想。这一历史使命和发展目标的确立,表明它还不是现存世界已存在的东西,它的实现必然是一个随着历史演进渐次展开的“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sup>[11] (P560)</sup>鲜明地体现着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实然与应然之间的矛盾。因此,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必须以现实运动为条件和前提,按

照既定的目标指向提出新的阶段性发展目标,并相应地作出符合每一阶段实际的战略部署,由此就构成了具有一定时间跨度、目标相互衔接的战略安排。<sup>[12]</sup>这实际上是从历史演进中对历史目标实现路径的战略回答,把民族复兴的显性目标和共产主义的隐性目标耦合成同向的实践活动,实现了从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向现实必然性的转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战略目标是作为规律在起作用的。因此,我们要对其作出历史性描述和开放性解读,准确把握“历史使命”出场的语境、路径、形态之间的内在连锁关系,从而深刻揭示“历史使命”的出场逻辑。

中国共产党人在接续推进发展战略过程中,总是根据我国社会发展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和情况发生的变化而对原有的发展战略作出及时调整和充实完善,这是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一把密钥。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形成并提出了“两步走”战略安排,这是在1963年9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制定国民经济长远规划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提出来的。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经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重申,逐步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安排:第一步,用十五年的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即“四个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一战略安排的目标指向就是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sup>[13] (P132)</sup>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反思,及时对发展战略作出了适当地调整,党的十二大着眼于20世纪末的奋斗目标即毛泽东和周恩来作出的“两步走”战略的第二步进一步细分为“两步走”的战略安排。与此同时,我们党把到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改了口”,逐步调整为实现总体小康。为此,邓小平在1985年经过反复考虑后,逐步形成并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关于第三步,邓小平最初的提法是“花三十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水平”。<sup>[14] (P117)</sup>这意味着第三步的最初设计有多重考虑,或者说是多种可能。党的十三大明确第三步要花50年的时间,也就是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三步走”发展战略是对党的十二大所规定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的丰富和发展,<sup>[15] (P524)</sup>它被写入党的十三大报告,表明我们党逐渐在实践中摸索到历史必然性在现实社会中的实现方式。然而,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性展开,内在的要求发展战略更加具体、更加明确。有鉴于此,为更好地实现跨世纪发展,党的十五大对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提出了分阶段的构想,也就是把“三步走”中的第三步再细分为三步,确立了2010年、2020年和21世纪中叶三个时间节点的发展目标,形成了“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实现了发展战略的又一次历史嬗变。今天回过头来看,正是这种以“目的性指向”为特征的实践展开,使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具象化为一个又一个推动民族复兴的历史事实,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规律和历史使命内在逻辑的理性认知和高超驾驭能力,推动着伟大梦想的实现无限接近。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断发挥,推动我国社会发展在很多方面超出了20世纪八十年代的估计,许多指标提前实现。随着历史场域的变化和空间存在的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经过科学审慎的分析,从历史使命的当代出场和历史承接出发,把“三步走”发展战略中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间节点从21世纪中叶提前到2035年,这并非是简单的年限变化,而是治国理政目标任务的重大调整;同时,提出了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这是一次伟大的质性跃迁。这就意味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是由3个相互衔接的阶段性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构成的。第一阶段是从2012年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阶段是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三阶段是从2035年到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目标体系和战略安排,使目标任务和历史使命的实现路径更加清晰。<sup>[16]</sup>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粗线条地描绘了到那时的美好图景。从文明的维度来看,它彰显着中共更为全面的考量,旨在实现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等五个方面文明的全面提升;从国家治理的维度来看,它意味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同步实现和协同发力;从价值追求来看,它意味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求索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将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从总体形象来看,它意味着我国将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sup>[3]</sup>从这一奋斗目标和宏伟愿景创生路径和演化逻辑来分析,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它的提出是重大的理

论创新和战略部署,是对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发展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既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战略思维和雄心壮志,也与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逻辑高度契合,科学阐释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文明进步逻辑及其路径,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引领性和可操作性。这一奋斗目标和宏伟愿景的实现,必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 四、理论新建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问题而形成的最新理论成果,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崭新的内涵。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sup>[17] (P875)</sup>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当代中国最高理论思维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一座高峰,它科学地分析了新的历史方位、历史特点、历史任务等重大课题,系统地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sup>[3]</sup>由此形成了一个反映时代特征、契合实际、主题鲜明、内涵丰富、逻辑严密、体系完整的科学理论。这一科学理论“不是以可能性为依据”主观臆造出来的,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客观基础上产生的,它既牢牢承继经典理论原则,又及时总结实践中产生的新鲜经验并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推动理论创新。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革命理论……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和生长出来的”。<sup>[18] (P298)</sup>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科学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思想基础,以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为使命担当和价值追求,以民族特色为话语体系,<sup>[19]</sup>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解决了新时代理论供给与理论需求之间的矛盾,必将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产生深刻影响。我们要在进行宣传性、解读性研究的同时,更加注重强化学理性研究,厘清它在哪些方面是继承性的内容,哪些方面是独创性的内容,哪些方面是原创性内容,揭示它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之间的内在关联,讲清楚它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进而科学认识它的理论贡献和理论地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要义、理论贡献集中体现在“八个明确”和基本方略中。其中,“八个明确”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当代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以及准确把握“伟大事业”各要素之间本质联系、必然要求、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紧紧围绕更好担负起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而凝练概括的具有原创性的重要思想。它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四梁八柱”,是“三大规律”在社会现实层面的集中体现和具体展开,从理论上回答了“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是什么”作出的理论回答,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三大规律”认识的深化。“基本方略”则是我们党首次提出,由“十四个坚持”构成,彰显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特色和实践诉求。可以说,每一个“坚持”都蕴含了丰富而深刻的内容,“十四个坚持”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实现了对既有行动纲领层面理论成果的整合创新,内在地体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想完美结合,是对“怎么办”作出的理论回答,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初心的执著和使命的担当。从理论上来看,思想的力量并不在于其自身的严谨程度,而在于它对现实的关切程度以及回答时代之问的水平。“八个明确”和基本方略是习近平在治国理政实践中、推进“四个伟大”进程中形成的理论认识。前者是指导思想层面的科学阐释,后者是行动纲领层面的理论解答,充分表明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已经上升到对规律自觉全面把握的新层次、新高度。在这里,要进一步追问“何以是”?我们要把“八个明确”和基本方略同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结合起来理解,它们既是在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指导下形成的,又是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的具体展开,也是对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的丰富和发展,三者具有相同的生成和演化逻辑,共同统一于新时代的时空坐标中历史性展开的治国理政新实践。这就意味着,只要我们把握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逻辑周延的思想体系,长期坚持“八个明确”和基本方略,就一定能够续写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就一定能够更有力地批驳“历史终结论”的有关言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在紧张”的又一次集中呈现和克服,并为其作出了独创性贡献,成为我们党在新时代推进理论创新的开篇之作。实践发展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地蕴含着时间尺度,因而具有确定性和开放性辩证统一的特征。在坚持和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sup>[20]</sup><sup>[P2]</sup>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实质呈现在“历史具体”的深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随着新的历史和空间场域产生而不断获得生长空间而重新出场的理论发展过程。随着这一过程的具体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立论根据相应地发生变化,从而内在地要求它根据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自身。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努力把握中国实际、按照中国特点更好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客观需要。<sup>[21]</sup>习近平着眼于国内外环境、社会主要矛盾和目标任务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一次实现了从“可能”向“现实”的飞跃,从而赋予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当然,“内在紧张”也是这一理论的内在品质和生长机制。它一经生成就具有超越产生它的实践基础的思想价值,必将对新的实践的全面展开和深入探索提供思想指引。然而,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继续,理论自身所具有的超越性就会面临新的挑战,从而对继续推进理论创新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将在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作用和良性互动中实现自身的成熟和完善,从而获得更为长久的理论生命力,更加强大的历史影响力。由此可以推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将开启全新的思想征程。

综上所述,对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成和创立来说,新时代是历史基座和逻辑起点,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是立论依据和逻辑中介,历史使命是目标指向和逻辑终点。因此,揭示新时代、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历史使命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就是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逻辑理路的关键所在,需要我们在学理上不断深化研究并作出回答。

####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J].求是,2017,(21).
-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5][美]蒂莫西·泰勒.中国崛起:一个国家的财富[N].参考消息,2017-12-24.
- [6][美]内森·加德尔斯.中国的党代会为西方敲响警钟[N].参考消息,2017-10-30.
- [7]王伟光,徐伟新.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发展动力[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7.
- [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9]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0]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2]王钰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治国理政目标的历史承接[J].广西社会科学,2016,(12).
- [13]周恩来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5]胡绳.中国共产党70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 [16]严书翰.党的十九大的重大理论创新[J].前线,2017,(11).
-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8]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9]齐卫平.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话语转换——从执政能力到治国理政能力[J].行政论坛,2017,(4).
- [20]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21]王钰鑫.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

(责任编辑:郭荣华)